

和谐社会与共享式增长

——评林毅夫、庄巨忠等所编 《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

龚 刚*

自 1978 年以来, 中国已经历了 30 年的改革开放, 这场激越国人、瞩目世界的变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过去 30 年, 中国经济给世人所展现的最为亮丽的一面是其经济的高速增长: 平均增长率高达 9.69% 左右, 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在 2%—3% 左右。然而,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经济也同样面临着许多问题, 而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针对中国经济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及时组织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 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我们欣喜地看到, 这些报告已被编辑成书 (见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敏, 2008), 以完整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该书的第一篇论文 (即第二章, 第一章为综述) 由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弗兹·阿里所写。在对亚洲国家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简单概述的基础上, 该文集中讨论了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 (特别是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与 20 世纪 50 年代卡尔多所提出的收入差距有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 Fields (2001) 的研究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可能通过财富效应损害经济增长。与此同时,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从而增大改革的阻力和难度, 并进而制约经济增长。该文从学术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该书的第二篇论文 (即第三章) 由亚洲开发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所写。该文为我们提出了“共享式增长”这一发展战略之概念性框架。这一概念性框架事实上贯穿了该书的其余部分。文章首先提出收入差距原因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 另一类是个人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前者包括家庭财富与权势、宗教信仰、社会关系、肤色、性别及所处地理环境等。由这些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大多反映为制度的缺陷、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而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程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E-mail: gongg@nankai.edu.cn

度是可以主观控制的,由此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是市场的酬勤惩懒,是市场良好机制的反映。这样的机制将鼓励人们勤奋工作、创业和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所谓“共享式增长”,就是机会平等的增长,而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要求在充分发挥市场酬勤惩懒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机会的平等,提倡公平参与。而为了促进机会的平等,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投入的服务,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第二,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机会。第三,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和消除极端贫困。

文章认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促进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是相辅相成而并非相互矛盾的。只有让更多的人更为平等地参与市场,才能使市场机制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显然,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中国政府目前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理念是一致的。与此同时,它也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吻合。

本书的重点(同时在本人看来也是最具争议的)是林毅夫和刘培林所写的第四章。该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生产模式的选择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系。这里,所谓又好又快发展显然是指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兼顾收入分配的均衡,即所谓的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由于经济学中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和前文所提的卡尔多理论的影响,这样一种兼顾在理论界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然而,按照林毅夫和刘培林的分析,经济能否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生产模式:当我们按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模式时,经济的高增长和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可以兼顾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要素禀赋的差别。一般而言,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富裕,劳动力相对稀缺,而发展中国家则与此相反。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是可以提升的,即资本将逐渐富裕,劳动力将逐渐短缺。而这样一种提升速度则取决于整个经济社会的资本回报率。按照林毅夫和刘培林的观点,只有当经济体内的企业具有自生能力时,资本的回报率才可能最大,从而要素禀赋结构才可能提升最快。

所谓企业自生能力是指,“一个拥有正常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将可以获得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所进入的行业和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是否符合这个经济体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则不具备自生能力,其生存只能依靠政府的扶持。在中国,这样一种扶持体现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的严重扭曲、资源的行政配置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等。

显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生产模式应该是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的，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模式是最有效率的。从而也使要素禀赋结构提升最快。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生产模式又是如何兼顾公平或收入分配问题的呢？

第一，已经知道，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选择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通常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能更快解决二元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居民能更快地提高收入。

第二，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所建立起来的企业，一般都具备自生能力，从而不需要政府的扶持和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它们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于是政府的收入可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补助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而政府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等能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从而促进机会平等的共享式增长。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其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之所以会出现收入分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 30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现实中，这表现为“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尚未告终，为保护和补贴不具比较优势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某些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干预；另外，旧的赶超思想尚未彻底改变也导致了一些新的赶超”。作为对中国近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种基本判断，文章认为，今后 15 年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超过中等收入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要素禀赋结构仍然不会根本改变。因此，为了更好更快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国仍然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唯有如此，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为人们所分享，收入差距的扩大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本书的第五章由卢迈和冯明亮所写。该章讨论了如何构建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以确保国家对教育、卫生和基本社会服务的投资及建立有效的社保体制，以促进机会之平等。汤敏则在第六章中探讨了中国的扶贫工作，以加强中国未来增长的共享性。在第七章中，李实与罗楚亮讨论了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发展经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从而从国际经验的比较中，证实了前文林毅夫和刘培林所提出的生产模式选择与就业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第八章，樊纲与张晓晶也从国际经验的视角讨论了拉美国家“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的经验与教训。根据这些经验与教训，文章提出在中国目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之政策选择中，应该重视初次分配（即前文所讨论的生产方式之选择）对收入分配问题之影响；注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与发展阶段相适应；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在第九章，林敏、庄巨忠、达玛·娅秀和林芬利用中国的统计数据对中国收入差距的状况及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实施共享式增长需要同时强调缩小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城镇内部的收入

差异。最后,在第十章,刘民权和俞建拖从金融因素的角度对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方面所遭遇的困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扩大有着显著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而出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在“和谐社会”这一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之时,《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及时为我们推出了丰富和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书中的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为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然而,尽管该书为我们带来了丰富和全方位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应同时看到该书就未来中国经济所提出的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察和建议。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作为对中国近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种基本判断,该书的第四章认为,今后15年内,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富裕的要素禀赋结构仍然不会根本改变。因此,中国仍然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我们认为这是该书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在其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之所以会出现收入分配问题其原因在于: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但其规模应该已大量缩小。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足够提高,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必将消耗殆尽。

为了使我们对中国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演算。假定未来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为4%,¹则经济增长率在8%的情况下,每年的就业总量按4%的速度增长。5年以后,就业需求将是现在的 $(1+0.04)^5=1.21$ 倍,7年后则是1.31倍。尽管对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将不再过剩。

事实上,民工荒已经在中国某些城市出现,而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²最近中国所出现的通货膨胀也或多或少地归因于农民工的短缺和工资的不断上涨。³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以提高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未来生产模式选择的主要标准,而一味追求劳动密集型,则未来通货膨胀的压

¹ 过去30年中,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左右。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中国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都是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允许多余工人下岗等。纯粹由技术进步(如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等)所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显然远小于6%。

² 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请参见Cai and Wang(2008)。

³ 这是关于当前中国通货膨胀成因的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

力将越来越大，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不得不放缓。

第二，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 and 技术的追赶过程。

然而，技术的追赶并不是立竿见影的。技术的提高需要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不断积累。从人力资本的延续性看，人力资本的提高要从小抓起，从幼儿抓起。技术的进步需要创新，而创新意味着用新的知识淘汰旧的技术（或生产方式），由于生产方式一旦被选择，则必须通过漫长的折旧过程才能被淘汰，因此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这也必然是个逐步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我们在剩余劳动力消化完成以后，才进行技术的追赶，则完全有可能使经济的追赶过程出现一段停滞时期。正因为如此，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 and 技术的追赶过程必然是重叠的（见图 1），而这同时要求我们应及早考虑技术的追赶，即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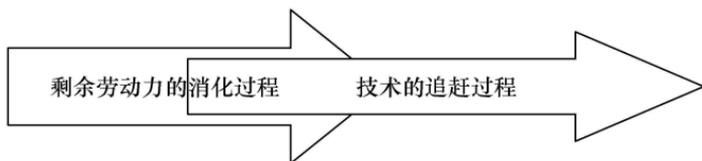


图 1 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过程

第三，就生产技术及产业选择而言，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至少，我们还应加入知识（或技术）密集型。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在面向 21 世纪的今天，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知识和技术。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知识经济是知识密集型的，这意味着具有高度知识和文化的劳动者是其主要的投入要素。知识经济必然是人均产出极高的经济，然而，这种极高的人均产出并不要求通过极高的人均资本（固定资产）拥有量（或资本密集型）而得以实现。人均产出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知识和技术以及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

因此，所谓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要求回到过去我们所曾追求过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或重工业化经济。事实上，中国的重工业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连续十几年在世界上排名第一，早就超过英美了！现在，我们所要赶超的是技术，是知识，是我们的人口素质。⁴

⁴ 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龚刚(2008)。

参 考 文 献

- [1] Cai, F. , and M. Wang,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n Unlimited Surplus Labor in Rural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8, 16(1), 51—65.
- [2] Fields, G. ,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 A New Look at the Developing World*.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 [3] 龚刚,《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种声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 [4] 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敏,《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

**Harmony Society and Inclusive Growth:
Review on *Towards a Harmony Society by
Inclusive Growth* edited by Lin Yifu,
Zhuang Junzhong**

GANG GONG
(*Nankai University*)